

试论唐代的公牍文写作

王朝源

(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, 四川 成都 610068)

摘要:公牍文,亦简称公文,是古代朝廷、官府常使用的公事文。在古代,这类文章名目繁多,且极受重视。尤其是唐代的公文,无论是从写作技巧,还是从语言结构,构思方式等方面来看,均比前代公文更具文学意味,而且折射出唐代文学思潮和创作风气的走向。

关键词:公牍文;骈体公文;实用;散体公文;生动活泼;刚健

中图分类号:H152.3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000-5315(2004)02-0102-04

公牍文,即古代朝廷、官府常使用的公事文,亦简称“公文”,一般分为上行公文与下行公文两大类。在古代,这两类文章名目繁多,且极受重视,虽然今天从文学的角度来考察,真正有价值的作品不多,但其中亦有一些佳作值得一读,尤其是唐代的公文,无论是从写作技巧,还是从语言结构、构思方式等方面来看,均比前代的公文更具文学意味,而且折射出唐代文学思潮和创作风气的走向。

隋唐以前,习惯上把公文归入笔的范畴,公文写作,不须用韵,也不必有文采,只须直言,着眼于叙事达意,施于实用即可,句式上多为四字句,其时大量的章、表、奏、启、书、记、论、说等公文多用骈体写作。进入隋之后,公文写作逐渐走上程式化、公式化的道路,形成一套固定的、呆板的模式,铺排事典,音韵和谐,文字淫靡,内容空泛,华而不实,辞滞而旨晦。进入唐代,公文写作的这些弊病依然存在,并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和注意,连上层统治者也参预其间。出于政治目的的需要,唐太宗李世民就曾对其大臣房玄龄提出,“文体浮华”之文,“无益劝诫”,主张“上书论事”,一律应“词理切直”[1](卷七),其主张得到了当时朝中一大批有识之士的响应和支持,开始

尝试用浅显的散体进行公文写作,历史上以敢于直谏而著称的大臣魏徵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。魏徵所写公文大多是谏疏,在这一类公文写作中,他摒弃了浮艳之词,以骈散相间,讲究实用。如历来为人所称道的《谏太宗十思疏》(见《全唐文》),即是一篇令人耳目一新的公文佳作。疏,即奏疏,是封建时代臣子向君王陈述意见的一种文体,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奏启》中对此种文体作了如下要求:“夫奏之为笔,固以明允笃诚为车,辨析疏通为首”[2],提出奏疏写作只须条理通达即可。魏徵的这篇奏议之文,既有深厚的内容,又讲究行文章法和语言的运用,不但条理畅达,而且极富文学意味,被推为古代公文之典范。该文在行文时,为避免一般公文写作枯涩之弊病,围绕“载舟覆舟”这一古训,用比喻、事实、哲言等论证方法来形象地阐明道理,劝谏唐太宗李世民要居安思危,修养自己的德行,对臣下则要虚心纳言,这样方能天下大治。全文文笔酣畅,一气呵成,情真意切。为了使自己的主张易于接受,所以在语言上,充分注意了句式的整齐,并以排比句式和对偶句式为主,适当穿插长短散句,跌宕起伏,富于变化,极具节奏感和音乐美。如下面这段文字:

收稿日期:2003-09-16

作者简介:王朝源(1965—),男,四川省盐亭县人,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。

诚能见可欲,则思知足以自戒;将有作,则思知止以安人;念高危,则思谦冲而自牧;惧满盈,则思江海下百川;乐盘游,则思三驱以为度;忧懈怠,则思慎始而敬终;虑壅蔽,则思虚心以纳下;惧谗邪,则思正身以黜恶;思所加,则思无因喜以谬赏;罚所及,则思无以怒而滥刑。总此十思,宏兹九得。[3](卷一三九)

这段文字骈散结合,伸屈自如,语约义丰,琅琅上口。同时,为了突出观点,作者还大量使用排比句式,增强了文章的气势。据说唐太宗接到此奏疏后,颇为赞赏,当即诏复之,且将其置放于案头,以资儆戒。

其后,这种骈散参半的公文文体很快流行,有了一大批追随者,如房玄龄、杜如晦、姚崇等人均能用朴实的散文奏对上疏。到了初唐文人骆宾王等人手中,公文写作在魏徵的基础之上,还呈现出新的特征。骆宾王为骈体大家,其公文写作尚未从骈四俪六中完全解脱出来,但已开始注意矫正骈文堆砌词藻的缺陷,其文大多内容充实,遣词造句讲求清新俊逸,展示出流走活泼的生气和刚健的骨气,给陷入僵化境地的公文注入了新鲜的血液,使公文这种注重逻辑思维的程式化文体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。如其公文代表作《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》(见《骆临海集笺注》)即是一例。檄,是古代用以声讨敌人的军中文书。这类公文在上古征战中就已开始应用,《文心雕龙·檄移》篇对这类文章提出了“事昭而理辩,气盛而辞断”[2]的要求。该文不仅完全做到了明辨是非,理直气壮,辞语精当,而且很有俊逸清新之气,显示了唐代骈体公文之新面目。文章写于公元684年,时武则天称帝,徐敬业首先带兵讨伐,在徐敬业幕中的骆宾王写下了这篇檄文,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,骆宾王在檄文中毫不留情地对武氏大加挞伐,虽有失公允,但就文章本身而言,却是一篇相当精彩的公文佳作。全文围绕一“伪”字,否定了武氏执政的合法性,并从从不忠、不孝、不仁、不贞几个方面着手,揭露了其罪行;然后用大量的笔墨渲染徐敬业在天时、地利、军威等方面的优势;最后对朝中文武晓以利害,明以赏罚,敦促他们弃暗投明。全文想象大胆,比喻生动,典故恰当,词句铿锵,气势磅礴。文章以四六字为主,间以五、七言,灵活多变,参差成趣,把骈文的音乐美发挥到了极致,一向被认为是檄文中的精品。现略举一段文字以见一斑:

是用气愤风云,志安社稷。因天下之失望,顺宇宙之推心。爰举义旗,以清妖孽。南连百越,北尽山河。铁骑成群,玉轴相接。海陵红粟,仓储之积靡穷;江浦黄旗,匡复之功何远?班声动而北风起,剑气冲而南斗平。暗鸣则山岳崩颓,叱咤则风云变色。以此制敌,何敌不摧?以此图功,何功不克?[4](卷十)

该段文字明显脱胎于六朝骈文,但继承了骈文体优美、内涵丰富的长处,适当运用长短句和对偶句,雄文劲采,气势壮盛,颇有感召力和鼓动性。就全文而言,虽是骈体,但又能破骈为散,或说理,或叙事,或陈情,运笔自如,丝毫不露斧凿之迹,在才华艳发,词采贍当之中,又寓俊逸之气,与一般六朝骈体公文不同声气,卓然有立,精妙绝伦。据《新唐书》载,武则天初读此文,“但嘻笑,至‘一抔之土未干,六尺之孤安在’,矍然曰:‘谁为之?’或以宾王对。后曰:‘宰相安得失此人!’”[5](卷二〇一)该段记载足以见该文的魅力。

象这种半骈半散的公文体制虽尚未摆脱齐梁文风,文章中骈俪化倾向亦十分严重,但已没有了传统骈体公文冗言赘词之弊,迈出了唐代公文文风改革的第一步,之后,很快在初盛唐流行。盛唐名相张说、张九龄等人的表奏也多属这种体裁。到一代公文大家陆贽手中,更是形成一种固定的格式。

陆贽,中唐公文写作巨匠,其所作奏议一类的公文,虽多用骈体,但已没有了骈文用典晦涩和词采雕饰之弊,较彻底地去除了此前骈文的丽辞浮藻,不用典,不征事,而代之以充分的散体文气,以散文风格写骈体公文,既有骈文句式整饬的特征,又呈现出明白晓畅的散体气象。可以说,骈体公文在陆贽手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造,是散体公文之萌芽,故其别树一帜的公文被后世奉为圭臬。《新唐书》本传云:“观贽论谏,数十百篇,讥陈时病,皆本仁义,可为后世法。”[5](卷一五七)《新唐书》例不录排偶之作,独取陆贽文十余篇;司马光作《资治通鉴》,亦重视陆公之公文,采其奏疏三十九篇,“上下千年,所取无多于是者,经世之文,斯之谓矣”[6](卷十五)。可见其公文对后世之影响,令人刮目。纵观陆贽之公文,不仅全不隶事,而且多用通俗语句,散体气息非常浓厚,这种风格引起了后世评论家的注意,如刘熙载在《艺概·文概》中说:“陆宣公奏议,妙能不同于贾生。贾生之言犹不见用,况德宗之量非文帝比,

故激昂辨析有所难行,而纾徐委备可以巽入。且气愈平婉,愈可将其意之沉切。”[7](卷一)这个评价极为中肯。陆贽之公文确能极尽委婉之能事,言辞温厚,不露锋芒,虽在形式上依然多用骈体,但语句整齐,声韵和谐,富有排宕俚偶之美,绝无呆板僵滞之病,陈情言事,无不畅达。

如《奉天论奏当今所切务状》,该文结构缜密,文笔流利,“真意笃摯,反复曲畅,不复见排偶之迹”[6](卷十五)。下面这段文字尤有代表性:

顷者窃闻舆议,颇究群情:四方则患于中外意乖,百辟又患于君臣道隔;郡国之志不达于朝廷,朝廷之诚不升于轩陛;上泽阙于下布,下情壅于上闻。实事不必知,知事不必宴;上下否隔于其际,真伪杂糅于其间;聚怨嚣嚣,腾谤籍籍,欲无阻碍,其可得乎……可以崇德美,可以济艰难,陛下何虑不行而直为此惶惶也? [3](卷四六八)

该段文字虽是排偶骈俪,但文笔流畅,有运斤成风之感,且在段尾用散句结语,使原本激昂的语气变得平缓舒畅,充分体现了陆贽公文辞婉而意严的特点。

又如《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》,紧紧抓住“务散发而收其兆庶之心”这个论点,引典辨理,举例佐证,极言利害,笔锋犀利,如号角鼓鼙。文章虽用骈体,但说理透辟,语言剀切,行文质朴畅达,一扫齐梁旧风,显现出散体公文之新面目。

可以说,陆贽在使骈体公文平易化、应用化的过程中,做出了突出的贡献,故曾国藩称誉说:“骈体文为大雅所羞称,以其不能发挥精义,并恐以芜累而伤气也。陆公则无一句不对,无一字不谐平仄,无一联不调马蹄,而义理之精,足以比隆濂、洛;气势之盛,亦堪方驾韩、苏。退之本为陆公所取士,子瞻奏议终身效法陆公,而公之剖析事理,精当不移,则非韩、苏所能及。”[8](《鸣原堂论文》)

唐代公文到了古文运动领袖韩愈手中,风格更是为之一变。在文以明道、气盛宜言等古文创作理论的指导下,公文写作领域骈俪文体和浮艳文风面临严峻挑战,公文文体文风改革提上议事日程。古文运动干将韩愈、柳宗元、元稹等人均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公文文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。特别是韩愈的公文作品,形式与内容达到了完美的统一,其公文形式上并未完全抛弃骈体,而是扬长避短,把偶对的技巧

化入散行单句,这样一来,公文之作既有对称之美,又错落有致富于变化,兼具节奏美和气势美,大大丰富了散体公文的写作技巧,赋予公文这种应用文体以文学的特质。如其公文代表作《论佛骨表》,一改传统表文面目,表志陈情,内容充实,不失为公文的范例。全文以大量历史和现实的例证,论证了信佛的荒唐无稽和对社会的危害,充分表现了作者排佛的卓见和过人的胆略。从古到今,从远到近,列举了大量事实,让事实说话,虽无精辟的理论阐释,但层次分明,极尽铺陈之能事,一改此类文章毕恭毕敬、婉而多讽的惯例,贯注了作者强烈的主观感情,直言不讳,动之以情,晓之以理,言辞雄辩激切,气势剑拔弩张,极具感染力,体现了韩愈古文气盛的特点。如下面这段文字:

今无故取朽秽之物,亲临观之,巫祝不先,桃列不用,群臣不言其非,御史不奉其失,臣实耻之。乞以此骨付之有司,投诸水火,永绝根本,断天下之疑,绝后代之惑,使天下之人,知大圣人之所作为,出于寻常万万也,岂不盛哉!岂不快哉! [9](卷八)

这段文字语气激昂,语言精炼,很能体现韩愈公文之特点。正如郭预衡在《中国散文史》中所言:“他的几篇奏疏都是敢于揭发事实,敢说‘群臣之所未言’……当然,最有代表性的文章还是《论佛骨表》……正因此,韩愈这类文章也就有内容、有深度、有力量。再加上韩愈的语言艺术不同凡响,便成为气势磅礴的好文章。”[10]

其后,将公文文体文风改革推向深入的是元稹。元稹在《制造序》中从理论角度详细阐述了其改革公文写作内容、形式、语言等的始末和主张。他在文中说:“自非训导职业,则必指言美恶,以明诛赏之意焉。是以读说命则知辅相之不易,读允征则知废怠之可诛。秦汉以来,未之或改,近世以科试取士文章,司言者苟务刑饰,不根事实,升之者美溢于词,而不知所以美之之谓。黜之者罪溢于纸,而不知所以罪之之来,而又拘以属以地,跼以圆方,类之于赋判者流,先王之约束,盖扫地矣。”[11](卷四十)在内容上,要求公文写作明辨事实,不能含糊其辞;在形式上,摆脱传统公文骈四俚六的对偶句式,以单行散句为主;在语言上,提倡删繁就简,力求质朴晓畅。他不但从理论上为公文文体之改革廓清了道路,更是在创作实践上身体力行,努力使公文写作为文学化。

《元氏长庆集》有文三十卷,补遗五卷,策、书、表、状、制诰、记、判、议、奏等公文诸体皆备。《新唐书》本传言其“变诏书体,务纯厚明切,盛传一时”[5](卷一七四),可见其奏疏一类的公文在中唐元和年间产生过十分深远的影响。如《同州刺史谢上表》,这是作者罢相出同州,临行之前写给天子的一篇例行公文,但作者在文中灌注了自己的个性、遭遇和感慨,通达事理,情意恳切,不假虚饰,是一篇文辞俱佳的优秀古文。

公文究竟是华浮之作,还是据实而书,这是公文写作领域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。华,指过分追求华艳的词藻,不顾事实本身;实,指秉笔直书,传递真实情况。该问题在晚唐再次浮出水面,引发争论。晚唐公文,又一次走上骈体老路。究其原因,有以下两点:第一,韩愈、元稹等人变应用公文为文学性散文的改革没有能一以贯之,未得到普遍的继承和发展。魏晋时就已兴起的骈体文到了晚唐,流行时间已长达几百年,形式日臻完备。再加上隋唐统治者长期以来又将骈文作为举拔人才的一项重要标准,这就为骈文的生存提供了合适的土壤。(唐科举考试,除诗、赋外,亦以“策”作为考试科目之一,称为试策或策问。其体或用散文,或用骈体。)第二,虽经古文家们几代人的努力,古文日益普及,但骈文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,一般公文写作很难逃脱骈文写作的固定模式。因而,随着古文运动的偃旗息鼓,骈

体公文在晚唐卷土重来,并最终形成潮流,取代了内力早已不济的古文。

这一时期的公文虽再次呈现骈体面孔,但与初盛唐相比,又有了一些不同的特点。以杜牧、李商隐、温庭筠等人为代表的公文作家们,大力倡导四六,重辞藻、典故、声韵、偶对,不少公文内容空洞,无异于文字游戏,重回魏晋骈体公文之老路,只是将初盛唐宏博典雅的文风转为华丽浓艳,更讲究用典的生僻和词采的繁缛,又一次落入华美绮艳的唯美主义泥潭。但瑕不掩玉,其中亦有少许佳作值得一读。如李商隐的《为濮阳公陈情表》一文,句式整齐,语言宛转,典丽清峻,属对精工而不害文意,于骈句中杂以散句,转换自如,文气飞扬,声韵铿锵,灿然可诵。李商隐是四六高手,他长期游幕,任从事书记之职,故《樊南文集》中多为四六骈体的书判、奏启等。他融合六朝徐庾和中唐陆贽骈文之长,所撰公文,属对精密,色彩秾丽,华瞻典雅,为晚唐公文写作之集大成者,所作公文,虽为官样应酬文章,于今观之,不免艰涩,但情致酣畅,笔力雄健。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卷十五评其文曰:“婉约雅飭,于唐人为别格。”[6]这个评价是站得住脚的。

总之,公文历经秦汉魏晋,至唐代已渐趋成熟定型,这种应用文字,在唐代文人手中不但风格有所改变,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时文学思潮和创作风气的走向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吴兢. 贞观政要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9.
- [2] 王利器. 文心雕龙校证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0.
- [3] 阮元, 董浩等. 全唐文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2.
- [4] 陈熙晋. 骆临海集笺注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5.
- [5] 欧阳修, 等. 新唐书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75.
- [6] 永瑆, 等.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5.
- [7] 刘熙载. 艺概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2.
- [8] 曾国藩全集[M]. 长沙: 岳麓书社, 1986.
- [9] 马其昶. 韩昌黎文集校注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6.
- [10] 郭预衡. 中国散文史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0.
- [11] 冀勤点校. 元稹集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2.

[责任编辑: 李大明]